

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科主办

古典文献学术论丛

主编 王政 周有斌
副主编 周生杰 郭全芝

第三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科主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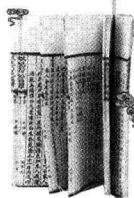
古典文献学术论丛

主编

王政

周有斌

第三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典文献学术论丛.第3辑 / 王政,周有斌主编.---
合肥:黄山书社,2013.2
ISBN 978-7-5461-3415-4

I.①古… II.①王…②周… III.①古文献学-文集
IV.①G25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1747 号

古典文献学术论丛(第三辑)

王 政 周有斌 主编

出 版 人:任耕耘
责任印刷:李 磊

责任编辑:周振华
装帧设计:陈 强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book.cn/index.asp>)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230071)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营销部电话:0551-6533762 63533768
印 制:合肥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0551-62827094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5 字数:450 千
版次: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461-3415-4 定价:5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本刊学术顾问

- 杨 忠 北京大学中文系
余恕诚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徐有富 南京大学文学院
张国星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丁 放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朱万曙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
胡传志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杜桂萍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牛继清 安徽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

主 编 王 政 周有斌

副主编 周生杰 郭全芝

编 辑 冀运鲁 任 荣

本辑特约编辑 张廷银

目 录

学术史与学术方法研究

兼容并蓄,不断创新

——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董乃斌先生访谈录

..... 董乃斌 熊 碧(1)

胡怀琛与寓言文学 王 润(9)

海外汉学研究

李白的黄山传承疏论 [日]寺尾刚 文 李寅生 译(14)

古典文献研究

屈原《九章》创作时间和地点略考 任 强 潘啸龙(23)

朝鲜文人金士龙及其《燕行日记》考论 黄修志(34)

汲古阁藏宋刻本存佚考录(下) 丁延峰(45)

明代词选三种叙录 曹秀兰(60)

《全元文》补遗七篇 邓富华(66)

古代风水文献研究述略 范春义(72)

李商隐《剑州重阳亭铭(并序)》考异 潘 鸣(81)

清初戏曲家周稚廉卒年新说献疑 陈小林(88)

文献学术札记

略论《楚辞》及其注疏中的农耕种植事象 王 政(92)

周代战前礼仪考论 吕华亮(97)

辽代“射柳祈雨”及古代以柳祈雨	臧志攀(106)
《诗》“童”辨	李杰玲(111)
《史记》合传中的人物“主从”关系	郭全芝(116)
汉魏谯沛区划变迁与曹操籍贯琐考	徐明英(122)
《史通》刘向、扬雄“知史务”札记	孙振田(126)
漫谈古代私家藏书文化	郭艳艳(134)
真德秀述评	林日波(140)
伯夷文化考说	欧阳健(149)
影印浙本《四库全书总目》断句疏误十二例	魏小虎(156)
古代服散浅论	孙铁林(161)
唐复散曲《韩信荒城》之“钩”字释疑 ——兼及《全明散曲》的一处讹误	张明远(169)
谈戴震的“说文学”成就	相宇剑(172)
赵翼诗论的史学意识	马梅玉(177)
“提壶挂寒柯”的死亡直观 ——关于《陶渊明集》一处异文的讨论	孙立民(183)
释上博简《孔子诗论》中的“忝”	张通海(188)

古籍版本研究

明清《西游记》插图本及其演进规律	乔光辉 孟庆漫(190)
宋遗民刘埙集版本考略	杜春雷(204)
中华本《史记》正义补	周 骋(211)
《萤窗异草》作者及成书年代问题述考	王海洋(218)

文学与文学文献研究

论《诗经》中与鱼相关的其他隐语 ——闻一多《说鱼》补证	陈 欣(224)
《玉台新咏》与《诗品》编撰比较	熊红菊(230)
《御览诗》选录诗人问题考论	孙桂平(240)
论宋人所见杨贵妃题材绘画及题画诗	涂小丽(253)

科学与迷信之间:《夷坚志》占验故事	秦 川(260)
张养浩诗文集版本及存佚考述	刘 倩(267)
中国古代才子佳人小说叙事模式新析	苏建新(278)
乱世警钟:清末民初传奇杂剧创作的三种旨趣	任 荣(288)
三百年来《聊斋志异》戏曲改编述论	冀运鲁(299)
《儒林外史》缺文献疑	姜 胜(308)
略论杂诗的起源和发展状况	周振华(310)

安徽文献研究

试论俞正燮对俄罗斯研究的贡献	余敏辉 张 扬(317)
《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补正	邱瑰华(330)
唐庆云和她的《女萝亭诗稿》	李秋橘(340)
安徽藏书纪事诗	周生杰辑(345)
汪启淑与南屏诗社	付嘉豪(376)
《酒德颂》“大人”形象对《庄子》“大人”形象的继承与偏离	高 深(381)

书 评

《〈汉语大词典〉书证溯源》读后	仲 昌(383)
评汤华泉教授新作《白居易诗选》	乔东黎(389)
稿 约	(394)



学术史与学术方法研究

兼容并蓄,不断创新

——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董乃斌先生访谈录

董乃斌 熊 碧

董乃斌,男,祖籍江苏扬州,1942年生于上海。1963年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81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获硕士学位。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为上海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文学评论》编委。学术兼职上海古典文学学会副会长等。

董乃斌先生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文学史学。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权威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社科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新世纪以来,先后主持完成“中国文学史学史研究”、“文学史学原理研究”、“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曾主编、参编文学史著作多种,出版《李商隐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文化素流中的文学与文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与程蔷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流金岁月》(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中华书局,2001年)、《唐宋名篇——唐诗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近世名家与古典文学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年)、《中国文学史学史》(三卷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文学史学原理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等多部学术著作。

董先生的研究成果获得过一系列荣誉:《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获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二等奖(2001),《中国文学史的演进——范式的视角》(论文)获上海市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2),《中国文学史学史》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2004)、第十九届北方15省市自治区社科优秀图书奖(2004),《文学史学原理研究》获上海市第十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010),《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1),《古典诗词研究的叙事视角》(论文)获上海市第十一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2012)。

熊碧(以下简称熊):您是国内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入选2011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这是对您研究工作的充分肯定。首先想请您简单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的主要内容。

董乃斌先生(以下简称董):《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是2008年立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2011年结题,2012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本书对学术界流行的“中国文学就是一个抒情传统”的理论提出质疑和驳难,以中国文学史的丰富事实为依据,以古代文学各主要文体为考察对象,对贯穿其中的叙事传统进行论证。全书除《导言》外,共十二章:第一章利用甲骨文和金文资料,从汉字构型论证先民的叙事思维,揭示某些汉字包含叙事内容的现象;第二、第三章从古代文论著作(《文心雕龙》、《史通》)发掘和梳理古人的叙事观,掌握其基本内容,总结其特色,并论证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第四章以《新唐书》列传为例对正史纪传进行叙事分析;第五章对被视作抒情传统主要代表的古典诗词进行叙事分析,以大量实例证明擅长抒情的诗词文体同样离不开叙事,抒情与叙事在诗词创作中是相辅相成的;第六章对从汉至唐的乐府作品进行叙事分析,进一步丰富对诗歌叙事传统的论证;第七章以唐赋为代表,对辞赋文学进行叙事分析;第八章对各类古代散文进行叙事分析,概括其特征,描述其发展演变过程;第九章以《西厢记》为例分析中国古代戏曲的叙事特征,论证中国文学两大传统互动、相益的关系;第十章以《聊斋志异》为例,论析古代短篇小说的叙事特征及其文学渊源;第十一章以《三国演义》为例,论析长篇演义小说的叙事特征;第十二章是全书总结,对上述研究成果从理论上做出概括,并指出今后研究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简括地说,我们的研究是想确立一种观点,即从文学表现角度看,中国文学史贯穿着叙事和抒情两大传统,而不只是一个传统;它们的关系是同源共生、互动互渗互益而又互竞争荣,在文学史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相互纠结并各自有所消长浮沉,呈现出变化多端、纷繁复杂的情状,从而成就了中国文学史的博大深厚和丰富多彩;这两大传统走过曲折的道路一直贯穿到今天,当代文学许多现象都与两大传统的渊源流变有关,因此我们的研究不能止步于古代,而应贯穿古代近代现代一直延伸到当下。

熊:《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学术意义何在?对学界会有什么影响?

董:根据上述内容,本书的学术意义可略述三点。首先,承续此前完成的《中国文学史学史》和《文学史学原理研究》两个研究项目,推进中国文学史贯

穿线和发展规律的研究,把已有的认识继续推向深入。其次,对“中国文学就是一个抒情传统”这一植根很深、影响广远的学术观点提出质疑。初步系统论证了中国文学史的叙事传统,为其取得与抒情传统并驾齐驱的地位奠定基础,为创建以“两个传统”贯穿中国文学史的理论体系迈出了第一步。再次,为中国文学史研究开拓出一片新天地,提出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为改变文学史研究的凝固模式和沉闷局面提供了可能。同时为打通中国文学史研究,使其能从古直贯至今开辟了途径,特别是在当代叙事文学品种日繁、且在整个文学乃至文化领域地位日益占据优势的情况下,为把文学史研究与当代文学艺术的批评研究、与国际同行的沟通交流寻找到一条可行之路。

至于学术影响,很难预见,需等待时间的检验。“中国文学就是一个抒情传统”长期以来是文学史研究,特别是中国诗学的主流观点,我们的本意虽主要是对旧学的补苴罅漏,以便对中国文学史的看法能够更符合实际,使中国诗学更健康地发展,但由于主客观种种原因,我们的观点也许仍然会引起学术界的不同意见,估计书稿出版后会引起同行们一定的注意,乃至争论和批评。如果真能这样,无疑是好事。学术需要切磋,真理越辩越明。我们很乐意接受各方面意见,与有兴趣的同行切磋,不断修正、完善自己的观点和论证,也希望吸引更多的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来思考这个问题。令人欣喜的是,确实已有一些年轻学者正用自己的研究对我们的工作做出很有价值的补充、支持乃至发展。无论最后对中国文学史贯穿线能否取得共识,我们有关中国文学叙事传统和中国文学史贯穿两大传统的一系列看法,对促进学术繁荣都会是有好处的。

熊: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是个庞大课题,所涉及面很广,仅凭个人力量短时间很难出显著成果。我们知道您是专门组建了一个学术团队来进行此项研究。您能谈谈这个学术团队的研究历程吗?

董:我们在2007年着手申报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的课题时,为此我们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包括研究现状调查、课题可行性研讨、子课题设计、队伍组建,等等。2008年它先被列为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后被国家社科基金批准立项。之后三年里,我们的学术团队(既有教师和博士后,也包括博士生)围绕这个课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我作为主持人,反复跟课题组成员阐明课题立意与要求,以统一思想、明确方向,并较早拿出全书总的提纲,据以讨论和分工。接着,各成员按子课题内容的需要认真搜集和阅读相关资料,其中三位博士研究生即以各自承担的子课题完成了自己的学位论文。其间有多次聚会研讨,或学习西方叙事学理论,或交换读书心得,或讨论陆续交出的初稿。这一活动对统一思想、明确目标和提高成员科研水平颇有作用。

随后,每位执笔者根据众人意见对初稿反复修改。包括我本人撰写的数章,也是数易其稿,广征意见。最后由我统稿。统稿不光是统一文字风格,也增删论点,补充材料,并给每章加写“小引”以勾连各章和增强文学史意味;改过的稿子不但退回原执笔者,且印发全体成员传阅,以集思广益。为了提高质量,我们还把初步定稿的各章,集印成“工作本”,请每个成员从头细读,相互“挑刺”,并邀请同行专家审阅,给我们提出宝贵意见。在此基础上,我们仍不断对原稿进行校改、补充,直到送交出版社。应该说,这个过程是比较费力的。我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工作的时候就曾参与和主持过一些大型的项目,深知集体科研写作的难处。本来,人文科学研究以个体操作为主,效果也较好。但必要的集体合作却也不可避免。我个人为此付出了劳动,但也有很多收获和乐趣。我们的团队是老中青三结合的,很团结,并且朝气蓬勃,相信每个成员通过这次工作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收获。当然,任何研究成果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书稿出版后,会发现这样那样的不足,我们诚恳地欢迎读者批评指教。我更希望课题组成员不以已出的书为满足,都能仔细地通读全书,以对全书负责和对学术精益求精的态度找问题,提建议,继续深化认识,推进研究水平,不断地拿出新的研究成果。适当的时候我们要召开一次研讨会,听取同行专家批评。我们会认真思考每一条意见,并酌情修改,使本书重印或再版时学术质量更上一层楼。

熊:对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您有何感想?

董:《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的标准是“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创造力”(《成果文库》出版说明),我们的书稿能够入选,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应该说,这是一个很高的学术荣誉,给我本人及课题组成员极大的鼓励和鞭策。不过,我们当初认真工作,并没有想到过这些,没有为得奖而努力的想法;当然今天也不能因为进了《文库》就止步不前。我们充分正视自己的不足,正视自己的知识与浩瀚的中国文学史的差距,还要将学习和研究继续深入下去。我认为,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大有可为;用叙事与抒情两大传统贯穿中国文学史,更有许多未知和不甚明了的领域值得探索。期待更多的学者能加入进来,共同推动中国文学传统研究的深入发展,以更好地认识中国文学的特征和价值。

熊:上海大学迄今已有三项成果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您对上大文科将来的发展有什么展望?

董:上海大学在钱老(注:钱伟长校长)的教育理念指导下,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上海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已经聚集了不少学术人才,建设成

一批重点学科与特色专业,其中社会学最为突出,中文学科也在努力跟上。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上大文科会有更多的学术拔尖人才涌现,有更多的学术精品入选《文库》或获得各种奖项。期待上海大学老中青三代团结一致,精诚合作,使我们的人才培养形成合理梯队,让我们的研究能够持续发展。我对上海大学的发展前景持非常乐观的态度。

熊: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作为国家最高的文学研究机构,大师、名家辈出。您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前后三十余年,与许多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比如何其芳、钱锺书、俞平伯、余冠英诸位先生共事多年,又曾经担任过副所长,与文学所许多同事都打过交道。随着老一辈学者的故去,您这一辈逐渐隐退,文学所的很多故事外人都无从知晓了。您作为文学所的历史亲历者与见证人,每一笔记忆都是宝贵学术史财富。您是否想过留下一些文字记录呢?

董:追忆往昔,总结历史,这在学术研究史上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确实跟你提及的那些大师级人物有所接触,而与稍稍年长或平辈的很多学者则更是多有交往,有的甚至过从甚密。我刚进文学所的时候才二十出头,所以大家都喊我“小董”,到现在见面都习惯难改。但是一转眼,我和同辈人也都步入古稀之年,更别提那些前辈了,所以有时候也有很多感慨。我的《近世名家与古典文学研究》一书里就有一章是对“文革”前两年文学所生活的片断追忆。我最近刚应友人之邀写了一篇纪念社科院文学所亡友的文章。写的过程中,往事历历浮现,心头感慨万千。很多学生建议我闲暇时候写写回忆录,还有学生提出帮我开建博客,好利用网络的便利与大家分享记忆的点点滴滴。这些建议和措施都很好,只是现在我还有各种事务缠身,没有精力和时间打理。希望以后能安排出时间来做一些相应的事情。

熊:您研究生时期的导师吴世昌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文史学家,您如何评价他的学术成就?他对您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有什么影响?

董:我1963年刚进文学所参加工作的时候,吴先生正好从国外回来不久,很荣幸跟他成为同事;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我又成为吴先生的入室弟子,亲炙门下;毕业之后又共事多年。所以,我对吴先生算是比较了解的,也受到他的许多影响。这里只能简略谈谈。

吴先生一生研究领域广阔,涉及文字学、音韵学、诗学、词学以及敦煌学、红楼梦学等多种学科,还创作了大量的杂文和诗词,而且精通英语,不但在英国讲学多年,培养了不少汉学家,还用英文写了《红楼梦探源》的著作。其才学之富赡,视野之开阔,思想之深邃,让我们这些后辈望尘莫及,钦佩不已。他当然是一位大师级的学者。

吴先生为人坦诚、性格率真,在治学上则是尊重事实,追求真理,不迷信权威,更不人云亦云。他指导学生,总是强调独立思考和创新意识,坚持若无新见,绝不发言著文的原则。吴先生的这种学术理念,对我影响很深。他所达到的学术境界我是心向往之,而自觉尚未达到。但我常以吴先生为楷模,要求自己不被成说所囿,而热衷于探索,做学问力排门户之见、先人之见,力争使思路比较开阔。同时,既专力于古代文学研究,也密切关注现当代文学,对史学、哲学、民俗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也颇有兴趣,并试着在文学研究中作综合的思考。回想起来,《李商隐的心灵世界》算是一次实践。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我比较关注西方的理论与研究进展,比如文体学、叙事学、文学史学等等,注意从中寻找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虽以小说为研究对象,其实也考虑了中国文学史的许多现象,并尝试将中西小说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融会贯通。这本书出版了近二十年,现在看来许多论述已嫌简单,需要大大补充修订,但基本思路似仍与今日对叙事传统的思考相通。如果说我的学业有一点进步,那的确都与当年吴先生的教诲分不开,而实在离老师的期望还差得远。

吴先生的学问我难以企及,他的品格有些方面也是我钦佩的,特别是他的勇于批评,勇于争辩,勇于坚持真理而不怕得罪人的精神。1932年,郑振铎先生出版《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吴先生那时才出道不久,郑先生则是早已成名。但对郑先生此书中存在的史料错讹、写法可商、观点或提法欠妥、文字表述的种种缺点和校对错误等,吴先生著文提出严厉批评,用语相当尖锐。这是需要勇气的。当然吴先生的批评文章在内容上,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充分说理的,所以郑先生虽然一开始有点不快,后来还是以吴先生为诤友,继续友好往来,并给予帮助。今天来看,两位前辈一位出于忠实科学、服膺真理而勇于批评,一位虚心纳谏、海量宽容,都表现出一种崇高的风范,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我对年轻教师以及我的学生,一直鼓励他们既尊重前辈和老师,也要敢于怀疑,敢于批评,敢于论辩,包括批评我,与我争论。我自己也是有什么想法和意见就直言不讳,开诚布公甚至不厌其烦地讲出。我希望,不但我们师生之间,而且整个学术界都能培养起一种唯科学与真理是从,以诚相见,直言无忌的坦荡风气。

熊:从1963年算起的话,您走上学术道路已快五十年。在这半世纪里,您持续不断对古典文学进行创新性研究并屡有创获,这其中有什么秘诀吗?

董:谈不上什么创获,更不存在什么秘诀。其实我在学术道路上也经历各种艰难困苦,只不过始终都没有放弃,乐此不疲地做着,可以说是不计收获,只问耕耘而已。这首先与我一贯的兴趣爱好有关,我始终认为兴趣是使学术研

究能够坚持下来的最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我从中学大学到研究生阶段,和在文学所多年,遇到了许多好老师,他们的身教言教,使我形成了比较成熟、有效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这后一条极为重要。我的初中语文老师盛吉甫先生,高中语文老师张梦兰先生,启发和鼓励了我对文学的爱好,帮助我迈出了第一步。上大学期间,朱东润、张世禄、蒋天枢、刘大杰等先生给我们授课,当时还是青年教师的王运熙和章培恒先生既讲课,又指导我们的论文。我之所以喜欢传记文学是受了朱东润先生的影响;喜欢李商隐诗,是受了王运熙先生的诱导。进入文学所后,曾经政治运动持续不断,没有机会系统做学问,但正如启功先生提倡的“猪跑学”理论所说,各位前辈先生的研究实践和成果,还是给了我许多启发和教益,使我受到熏陶濡染。我也利用各种机会和条件进行学习。1972年从河南干校回到北京,我把李商隐的诗歌系统读了一遍。硕士阶段在吴世昌先生指导下,以《李商隐研究》为题做了毕业论文。有一段时间,我的学术兴趣与注意力都放在了李商隐其人其诗上。《李商隐传》是在研究生时完成的,但当时出版难,书稿搁在出版社多年,拖到1985年才印出。《李商隐研究》虽答辩通过,我觉得尚不成熟,没忙着谋求出版。经过几年打磨,修改充实为《李商隐的心灵世界》面世。后来接受所里“大文学史”的编写任务,对整个唐代文学都摸了一下,着重重读了几个晚唐诗人 and 唐传奇,奠定了研究唐代文学的基础。我在文学所的新学科室和古代室都呆过,以在古代室时间为长,我的研究工作总是与所里的工作安排有关,把个人志趣与工作任务相结合。比如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学术史的回顾与展望成了大家关心的重点,我也自然地卷进了这股思潮,在这方面参加了不少会,写过不少文章,还编过一些书。正因为这段经历,使我对文学史学产生了极大兴趣,从学术史的回顾导出了新课题。从九十年代后期,陆续搞了《中国文学史学史》、《文学史学原理》和《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这样的系列项目。做这些项目,完成这些项目,不但收获了科研成果,更收获了丰硕而难忘的友谊,使我充满了感恩的心情。你问我有什么“秘诀”,我说的这些,你说能算秘诀吗?

熊:您在古典文学的研究方面可以说是集大成者,堪为后辈学习榜样。您对年轻一辈研究者有什么建议呢?

董:集大成谈何容易,怎么能拿来作为对我这样的人的评价?因为时代的原因,除极少数有心人和佼佼者外,我们这一代的大多数人浪费和被浪费了太多的光阴,学术年龄都需减去一二十年来计算。即使没有“文革”,也不是一般的学者都能集大成的。我经历了“文革”,本身资质也是平平。我真正开始学术研究已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已到不惑之年。集大成不是我所能达到的,也不是我追求的目标。我只愿也只能做到珍惜时间,脚踏实地,多历练

砺,使心智较为成熟,对万事从容淡定,锲而不舍地从事力所能及的研究,不惮烦,不急躁,不图功利,秉承我的老师们的教诲,在文学史研究中努力提供一点自己的见解,为中国文学史大厦添一块砖加一片瓦。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我现在已经年过七十,但对研究工作依然抱有极大的兴趣,似乎看书思考和写作已经成为我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要身体许可,我会一直这样地走下去。当然,人总有老去的一天,所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自知今后很难再有新的跨越,我现在特别乐意看到年轻一代的成长,为他们取得的成绩高兴。我羡慕他们,也愿意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去帮助他们,发扬“人梯精神”。当下优越的条件是以前无法想象的,但是种种物质的诱惑也多,随之带来的精神压力也大。我很期望有志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年轻人能够静下心来,排除各种干扰,摆脱短期效益和名利的羁绊而专注于学术。我坚信,年轻一代一定会在学术上胜过我们。

熊:谢谢您接受采访!我觉得可以用“兼容并蓄,不断创新”这八个字来概括您的学术研究特点和贡献。真诚祝愿您健康长寿,期待您给学界带来更多的成果。

董:谢谢!

采访、整理者:熊碧,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

受访者:董乃斌先生,上海大学终身教授

采访时间:2012年9月

胡怀琛与寓言文学

王 润

胡怀琛(1886—1938),原名有怀,字季仁,后名怀琛,字寄尘,安徽泾县人。胡朴安幼弟。小时候跟从长兄胡朴安在私塾读书,后去上海育才中学读书。他受徐光启等人的译著影响,思想新颖,具有革命之志。1912年,与柳亚子义结金兰,入南社,曾任《神州日报》、《太平洋报》、《中华小说界》等报刊的编辑。在广益、进步、文明、商务等书局担任过编辑,又先后在中国公学、沪江大学、国民大学、持志大学、正风学院等校任教。在编辑和创作之外,胡氏亦投入大量的精力进行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研究更遍及哲学、古典文学、佛学等众多领域。值得关注的是,其创作与研究还包括寓言文学这种不被传统文人重视的民间文学。他于20世纪30年代先后出版了《佛学寓言》、《中国寓言研究》、《百喻经浅说》、《快乐之水》和《中国寓言集》等著作,其中《中国寓言研究》首次对寓言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佛学寓言》、《百喻经浅说》、《快乐之水》、《中国寓言集》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的再次探索 and 创作。胡怀琛的寓言文学研究在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大的学术意义。

—

《中国寓言研究》1930年1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以中国寓言的古今发展为主要脉络,对作为一种文体的寓言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该书是20世纪中国寓言文学研究的第一本专著,开了中国系统研究寓言文学之先河。正如胡氏在书中所说,中国寓言的专书,在民国以前,只有一部,在民国以来,只有一部。第一部是明朝人辑的,辑者名叫徐元太,书名为《喻林》。这部书,到现在是极少见的。第二部则是民国六年(1917年)沈德鸿辑的《中国寓言初编》。“至于关于寓言研究的专书,恐怕要算我这本小册子是第一

部。”^①多年以后,著名学者吴秋林也肯定了这一点,他说:“中国现当代第一个有较大成就的寓言研究家当推胡怀琛。他在1930年出版了《中国寓言研究》一书,这是中国寓言系统研究的开篇。”^②《中国寓言研究》全书约3万余字,分八个章节,篇幅虽不大,内容很丰富,对世界范围内的寓言、中国古代寓言和近代20年的寓言都有所涉及。书中胡怀琛的观点以及对中国寓言某些问题的探讨,无疑具有开创性。

一是对寓言文体的定义。《庄子·寓言》云:“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借外论之。”这是现存最早的对于“寓言”的界定。庄子所说的“寓言”是用来“借外论之”的,是语言表达的一种方式,是说话者假借外物以立论的技巧,并没有将之视为文学体裁。然而,从“借外论之”已经可以看出“寓言”的特征。《韩非子》中称之为“说”;刘向称为“偶言”;刘勰把它归为“诸隐”类,作“隐言”;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把佛教寓言翻译为“譬喻”;唐宋多名为“说”“戒”“言”。从先秦到清末的两千多年,寓言一直客观存在,但寓言都不是以“寓言”的称谓出现的。直到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林纾翻译“Aesop's fables”(《伊索寓言》),为了指称“fable”这类短小的文学篇制,引《庄子》“寓言”一词来对译。“寓言”正式作为文体出现,并被正式使用。民国六年(1917年),茅盾编《中国寓言初编》一书,序言中也只是说:“寓言乃启淳于设大鸟之喻隐语以盛孟子言,性取象于湍水公孙论名借观于白马。”^③与《庄子·寓言》中的“借外论之”相似。林纾和茅盾虽然把寓言这种文体呈现给了学界,却并没有给其作具体定义。而胡怀琛在《中国寓言研究》第一章“何谓寓言”中则明确指出:“寓言,是用文学的方式,说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是暗示真理,或是包含一个道德的训条。”^④故事是一种文学体裁,胡怀琛把寓言和故事放在一起,可以理解为把寓言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寓言”的特色为:“不是用说明文把这个道理写出来,是用故事的方法演绎出来,使读者自然明白这个道理。”^⑤

二是首次涉及中国寓言的起源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胡怀琛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在“中国寓言产生的时代”一章中说:“中国的寓言,究竟产生于什么时候?一般的人,都说:产生于战国的时候,产生于庄子、孟子的时候,因为在

① 胡怀琛《中国寓言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42页。

② 吴秋林《中国寓言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52页。

③ 沈德鸿《中国寓言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

④ 胡怀琛《中国寓言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2页。

⑤ 胡怀琛《中国寓言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2页。